“90 后”新就业观：

待遇诚可贵 爱好价更高

■本报记者 韩天琪

时间即将进入 5 月，又到了一届高校毕业生说再见的时候，走出象牙塔的“90 后”们正面临着找工作的人生大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90 后”是“堕落的一代”，缺乏责任感，对未来没有打算，不像“80 后”那么吃苦耐劳。尽管“90 后”初入职场，但其高离职率已经声名远播。

但“90 后”们对自己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对于工作有着更为独到的看法，那就是“待遇诚可贵，爱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就业观转向

自 2011 年以来，随着“80 后”群体逐步迈入而立之年，并成为社会中坚力量，“90 后”大学毕业生也开始大批量“上市”。而在此之前，许多没有进入大学的“90 后”青年，早已经随着打工的大潮，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

在大多数“60 后”、“70 后”甚至部分“80 后”的眼中，一个“好工作”至少应该带有“稳定”的特点。在“单位”承载着一个人绝大多数职业生涯的年代里，一个工作单位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个人的事业发展、薪资待遇甚至人生选择。

但这种就业观念在“90 后”身上发生了转向。

近日，一份针对北京工商大学 682 名各年级研究生的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90 后”研究生中，有超过 80%的学生表现出对“创业”的兴趣，近 60%的学生考虑自主创业。

“面对日渐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趋势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90 后”这些职场新生力量正在思考如何来面对这些变化。”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杨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爱冒险”的“90 后”

2014 年对于中国的创业市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高校毕业生连续接近或超过 700 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政策的积极扶持都成为助推创业浪潮的力量。

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熊慧表示，“90 后”的学生们“有想法”“不甘心”，而这种冒险精神、热情和创意是他们渴望投身创业的主因。针对“90 后”大学生的调查和数据分析显示，“90 后”大学生创新性、冒险性和主动性的人格特质对创业意向有着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创业意味着敢于冒险并且愿意承担风险，不怕失败，拥有自己的主动权并且积极主动去做事情，愿意将自己的创意或者别人的创意付诸行动。”杨壮说，“拥有创新性、冒险性和主动性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选择创业，也更容易坚持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时代的特征和机会让“90 后”的青年们更具冒险精神，从而有更强烈的创业意愿。在就业观上从“稳定的单位工作”到“创业”是大势所趋。

除此之外，程杰认为，积极的政策和舆论导向对青年人创业意愿也是莫大的鼓励：“2014 年创业大潮初兴与近几年的政策导向和舆论导向有关系。青年人，尤其是刚刚毕业走入社会的“90 后”们在心理上更加认同创业这样一种就业形态。”

创业别单干

“在创业氛围的感染下，很多年轻人有可能带着一份激情和冲动去盲目创业，在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发现：原来创业不是简单的事。”程杰提醒准备创业的年轻人们，创业不能心血来潮，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研究人员抽样调查的“90 后”大学生中，渴望创建自己企业的得分比问卷平均分要高，但是毕业后五年内创建自己企业的得分却比平均分低很多。这也正是程杰担心的一点：如何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动，并且提高创业活动的成功率呢？

杨壮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兴趣和技能。“成功的创业者都具有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人格特质。”杨壮说道。

在现实生活中，导致创业意愿夭折和创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杨壮向记者列举：第一，很多人在创业过程中没有摆脱家长制思维，唯我独尊；第二，很多创业者缺乏团队协作能力，有些创业者在专业或技能方面可能具备了创业的素质，但创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互补。

“以我在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创新学院的调研经验来看，那里的创业者一定是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经营人员的合作和互补。在我国当前的创业团队中还是缺乏合作共赢的文化。”杨壮说道。

程杰对此表示赞同，“以高技术创业为例，我认为高技术创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技术转化为实际的、有效的生产力。高技术创业也并不意味着拥有技术就一定能成功，理工科的学生如果可以和综合性大学、专门从事创业投资的平台建立比较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将技术和市场上的投资、管理、运营整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各方优势。”

程杰笑言，“大众创业”的内涵并不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单干。技术只有通过市场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才能扮演好它在创业当中的角色，创业还是整个社会系统整合资源的过程。

对此，杨壮和程杰都建议，各高校有必要开设关于创业的课程规划和实践指导，而有创业意愿的青年人也要尽早作好准备。

“创业指导课程应尽早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不管青年学生最终是否选择创业，他都应该对创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认识，具备对创业的基本理解和能力。”程杰说道，“从学校和学生个人的角度来说，能做的是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创业大潮中保持足够的冷静，作好更充分的创业准备。而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大力支持和配套措施则是政府的责任。”

“大学生们首先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兴趣和技能有清晰的认识。若有创业意愿并适合创业的话，在进入大学校门后就要开始有意识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积极地探索和积累，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和角色。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创业的成功率。”杨庄建议。

论道

创业循环系统为科技与经济结合提供动力

■李研

美国硅谷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创新经济区之一。硅谷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创业循环系统。这一循环系统以创业型企业的不断创立和退出为核心，由发达的创业服务业和资本市场作为支撑，确保了硅谷不断创新的活力。

硅谷创业循环系统

（1）创业型企业成立和退出。创业活动能够循环起来成为一个系统，意味着不断有新的企业成立，同时不断有现存企业退出市场。在硅谷，这两种情况都同步持续发生。新企业的成立有多种来源，现存企业的退出也有不同的方式。新企业成立方面，首先，硅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能够通过它的师生创业的方式，衍生出新的科技型企业。

其次，已经创业成功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硅谷企业，还会因其员工选择辞职创业而“吐出“新的企业。最后，创业失败的硅谷企业家，还乐意选择再次创业，这也可能带来新的企业。现存企业退出方面，在硅谷创业成功的小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有可能被大公司收购，这实际上是一种退出机制。另外，创业型企业的高风险性，意味着它失败的几率很大，硅谷企业家创业失败自然也是一种退出市场的行为。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新企业成立和现存企业退出都是普通的现象。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范围内的这两类活动都非常频繁地发生，无论新企业的成立还是现存企业的退出，节奏都明显加快。另外，硅谷地区无论是企业成立还是企业退出，都跟科技有关。硅谷内企业高频率地进入和退出市场，使硅谷这部创新机器转了起来。

（2）创业服务业。在硅谷创业循环系统中，创业型企业位于中心位置，一系列专业的创业服务由围绕它的各种创业服务企业提供。在任何一个国家，创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成立一个新的企业需要企业家完成很多常规性任务，比如申请贷款、填写法律文书、招聘关键岗位员工、创建企业财务系统等。当科技型企业家面对这些任务时，他们需要创业服务企业提供帮助。这些创业服务企业，是硅谷创业循环系统的加速器和润滑剂。

从硅谷发展的历史看，它的创业服务企业也是逐步走向专业化的。在硅谷发展初期，也存在着创业服务企业，但是它们还没有多少服务科技型企业家创业的经验。在反复为硅谷创业型企业提供各种创业服务后，这些企业的经验也丰富起来，并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专长，最终造就了今天硅谷创业服务业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的局面。创业服务企业经验的不断积累，使得硅谷创业循环系统运转不断加速，创业型企业成功率不断提高。创业成功率的提高，又为硅谷带来了正向的反馈效应，鼓励更多科技人员参与创业活动。

创业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没有统一的标准，它取决于一个国家当前的创业环境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此外，由于科技型创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本身就是不断更新的，这意味与之相适应的创业服务业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发展成熟的创业服务业，会随着科技进步的步伐不断向专业化、技术化角度发展。根据硅谷的经验，围绕创业循环系统展开的服务大致包括法律服务、员工招聘服务、财务服务等。提供这些服务的分别是律师事务所、猎头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

（3）资本市场。硅谷的风险投资支撑了创业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发达的资本市场则是风险投资类企业发展的前提。风险投资商像是资本市场内的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存在使得本来“沉睡”的资本“活跃”起来，被配置到创新更加活跃的领域。创新驱动模式下的资本市场，能够为风险投资类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和退出机制，从而支撑创业循环系统的运行。

决定硅谷资本市场的发达的更为关键之处在于，风险投资资金具有多元化的退出机制，实际上发挥了创业型企业连接资本市场“通道”的作用。

为科技与经济结合提供动力

硅谷的创业循环系统能够运转起来，关键是把科技型企业家放在了中心位置。无论是创业型企业的成立和退出、创业服务还是资本市场，都试图充分发掘硅谷内“人”的潜力。

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科学研究（包括技术发明、创造）和经济活动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人类社会的科技实践和经济实践虽然同步发展，但始终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这就是市场。在两种完全不同激励机制、制度约束下开展活动的人们，自然会形成各自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也造就了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不易结合的“惰性”。这种“惰性”体现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对话”的困难。科学家关注科学发现、新技术的创新性，而企业家想的是市场、销售、成本等问题，二者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对于硅谷人来说，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身份界限早已模糊。不断有人在硅谷的科技与经济间“跨界”，拉近了这两种本来分离的活动间的距离。

硅谷创业循环系统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的问题。硅谷的创业循环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1）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科技成果实现经济价值过程中的“关键一跃”是市场的培育。然而，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科技型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不断“闯出来”的，是在反复的试探、调整、再试探、再调整中完成的。在市场培育的过程中，技术的领先性固然重要，然而同样重要的还有硅谷人具有的敢闯敢试的精神，这正是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内涵。

（2）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然而，需要认识到企业在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根据硅谷的发展经验，在一项科技成果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小企业（创业型企业）更多的是扮演探索者的角色。我国在强调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分析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发现、市场培育、技术改进等方面的不同作用，研究制定更加具体、有针对性的政策。

（3）把人作为政策设计的对象。政策的效力最终要靠影响人的决策显现。要让创业行为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动力，关键是要改变人的选择。硅谷创业循环系统提示我国，要让创新活跃起来，首先要让科技人员能够自由流动。例如，“编制”对于人的束缚怎样打破，如何建立“去单位化”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此外，还需支持创业服务业的发展，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专业化的创业服务，帮助科技人员解决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声音

法治与人性

■翁晓斌

每次看到有官员尤其是小官被绳之以法的消息，笔者都会自作多情地庆幸一把：幸好当初没有选择进机关，而是做了一名教书匠。若当初选择做一名公务员，一路下来，有个一官半职还是可能的。假定成为一个处级干部，手上又有权，自己会不会腐败？我不敢说一定不会。

会和不会的理由都有，两者旗鼓相当。以下几种情况，可能会使我沦为腐败分子。

其一，周围的人大多都在搞腐败，我很难孤独地拒绝腐败。其二，通常情况下出身草根的官员，腐败了才能升迁，不腐败原地不动。其三，对我有知遇之恩且仍有提携之权的领导是个腐败分子。其四，有人托我办事，愿意给我丰厚回报，事情是合法合纪的，且我真的缺钱，且东窗事发的风险极小，于是斗胆把钱收下。其五，铁杆朋友有难处，希望我滥用一次权力，我实在推脱不下，就破例了。以后朋友给我好处，我也收下了。其六，老婆爱钱，在老婆的威逼利诱之下，我腐败了。这个可能性当然是最小的，但的确不能排除。如果笔者真的做了小官，以上情形之一发生的话，由于笔者个性有缺陷，境界也不高，定力又不行，很有可能接受审判、锒铛入狱，在铁窗下苦苦煎熬。

笔者大体上还算个有良知的人，一直坚定地认为自由和尊严比什么都重要。相信很多贪官也不是一开始就丧失良知的，也都知道自由和尊严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我甚至愿意承认，贪官在堕落之前，人品和境界并不低。但他们入狱了，而我没有。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贪腐而我没有贪腐，还不如说他们有机会贪腐而我没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向那些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洁身自好的官员致以由衷的敬意，但我更愿意把更崇高的敬意投给让为官的人不能贪腐的制度。

人性总是有弱点的，面对权力带来的诱惑，总会有很多人迷失。对于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法治不过就是让权力受到充分约束，将滥用权力的空间压缩到最小，而将风险放大到最大。法治让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做一个太平官员，不用在诱惑和恐惧中活得像个赌徒似的。

譬如在高校评职称，申报有统一的标准，评选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人为操作空间不是绝对没有，但很小。所以，很少听说哪位高校领导因为评职称而受贿的，也没听说哪一位教师靠行贿而荣升教授的。某种意义上说，评职称的一系列制度就是法治成功实践的一个标本。诚然，评职称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还是有，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绝对不是取消这个制度，而是完善它。

每次当法治成为一个社会改良的方向时，总有那么一些人喋喋不休、语重心长地提醒人民群众不要迷信法治，好像法治曾经给中国人带来过多么惨痛的伤害似的。法治如果是一贴治世之药，这些人全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药到底有没有疗效，就知道说这药副作用有多大。这些人中不少正在官位上享受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也不想想，那些身陷囹圄的贪官在出事之前几乎都与他们一样，如今一墙之隔，对法治的想法应有所不同了吧。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漫话

驾照自学能遏制驾校收“红包”现象吗

■沙森

公安部于近日表示，今年内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自主预约考试、异地考试将展开改革试点。消息一出，不少正打算考驾照的民众拍手称赞。专家也表示，这些措施不但便民，有利于加快拿证的进度，同时也能减少腐败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驾校收费持续上涨，不少地方驾校学车价格突破 1 万元。驾校乱收费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明收费，一个是暗收费。比较常见的乱收费诸如送考费、补考训练费、看考场费等等，这些是明收费。还有就是暗收费，学员为了争取到上车的机会，不得不塞红包、请吃饭、送礼物。

公安部公布驾考试点的消息之后，有关网络民意调查显示，近 9 成人认同这个政策，并表示若政策放开，愿意选择自学直考。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担心驾照自学自考会产生更多的“马路杀手”。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是：驾照自学自考后，考生有没有权利选择脱离驾校学车？自学自考驾照者怎么练车、报考？驾照自学自考会不会产生新的驾驶培训收取红包现象？

所有这些疑问都等待着该项政策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和落实情况。只要报考和考试环节公开透明，考试标准明确清晰，相信驾照自学自考会成为广大民众考取驾照的一条新路。

涂梦萦供图

e见

对于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基础教育，要在现有的基础水平上加大投入。不仅仅是资金上的倾斜，师资方面的投入也要加大力度。现在的支教志愿者行动只能是一个过渡的做法，因为这样状态的师资队伍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作用。志愿者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但又是不系统的。他们一旦离开，或者有新的志愿者加入，孩子们都需要重新调整，重新适应。

——胡懋仁《底层人才上升的通道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8176-875464.html）

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对于每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因为当初进入科研这个行业时，人人都曾获得科研启动资金。经过几年的拼搏，对于已经取得了科研成果，晋升了高级职称的人，工资自然也得到了提高，掌握了回报社会并享受研究成果的能力，自然到了该“断奶”的时候。而那些拿了科研启动资金，并未取得什么科研成果的人，或者对科研不再感兴趣，或者不具备较强科研能力，想离开科研岗位，另寻出路也是合理的选择。在人生最需要钱的时候，曾得到政府的资助，也应心怀感激地寻找更合适自己的位置。

——汪晓军《如何让新入职的博士或博士后渡过生活与工作难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2399-883769.html）

当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产生巨大的差距，妥协和落后是必然的结果，明代经济最发达的苏锡常地区，被剥削得很厉害（解放后上海曾经养活全中国），这种人为的劫富济贫，对整体的经济落后局面负有很大责任。所以，中国社会的落后，未必如同李约瑟难题所言，是科技落后的结果，而是科技落后的原因。因为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导致了明末传教士带入中国的 7000 册欧洲科技图书，大多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社会的发展需要被政治屏蔽和压缩了，产生不了推动科技发展的社会动力。

——麻庭光《说说爱因斯坦来信的文化背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2992-883732.html）

对于独立第三方评估的探讨，在学术界早就不是一个新问题，理论层面的难题基本解决了，然而在实践上却鲜有成功的案例，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当下一些所谓的第三方，大多与利益方有着各种隐秘的联系，结果导致这些机构被称作“伪第三方”，由于各种监管、监督的制度性缺位，伪第三方的盛行导致真正独立第三方还未降生，就已奄奄一息。

——李侠《科技界的独立第三方评估何以可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861464.html）

（罗萨整理）